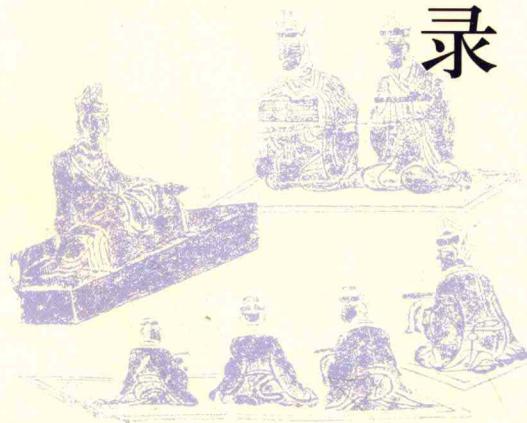


珞珈中国哲学

珞珈思存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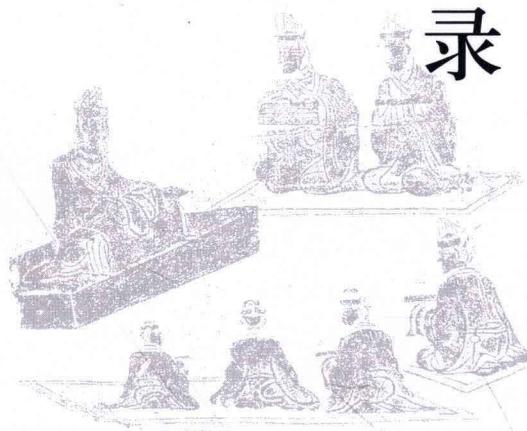
田文军 著

中华书局

珞珈中国哲学

58

珞珈思存录



田文军 著

B2
1662-2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珞珈思存录 / 田文军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9.11
(珞珈中国哲学)

ISBN 978 - 7 - 101 - 07017 - 0

I . 珞… II . 田… III . 哲学—研究 IV . 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9893 号

书 名 珞珈思存录

著 者 田文军

丛 书 名 珞珈中国哲学

责任编辑 石 玉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1/630×960 毫米 1/16

印张 23 1/4 插页 2 字数 32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7017 - 0

定 价 52.00 元

珞珈中国哲学：通向未来 中国哲学的一条可能之路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新的知识分类体系的逐步确立。而在这一新的知识分类体系里，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传统的经史子集里分离出来。由于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外来知识体系的新学科没有自己的历史及其固有的形态，在20世纪初期只能仿照西方的哲学学科体系来构造“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知识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语）的思想史的创作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两代学人就中国哲学史教学体系与研究方法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哲学史观与方法论问题，展开了多次研讨争鸣，认真反省“中国哲学”学科与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也表述了对中国哲学自身身份认同的焦虑。

其实，在20世纪初期，有关“中国哲学”概念的具体内涵，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诸先生都曾给出过自己的界定，如金先生在为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写审查报告时，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这二者的不同，而他本人则倾向于用一种没有“成见”的态度写一种“在中国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而冯友兰先生本人在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就明确地说，他是“就中国历史上各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明显地以西方哲学学科为标准来写一本“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史”。张先生则辨析了“中国人的哲学”与“中国系的哲学”的差异，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可以包括印度系的哲学如佛教哲

学,而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则主要是“中国系一般哲学”(《中国哲学大纲》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谈论“中国哲学”问题,有一个不容抹杀的思想史事实,那就是:20世纪的现代思想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在这样的历史起点上谈“中国哲学”问题,就无法回避已被纳入到中国思想传统的西方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发展历程而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化则是一个短期发展的结果,但它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却又有其重要的方向性意义。中国文化究竟该沿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论争已经基本上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方向,那就是立足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广泛吸纳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走综合创新之路。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偏离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方向,也将走一条“综合创新”的道路;而如何“综合创新”,则将是言人人殊,各有胜途。

武汉大学地处中国大陆中部,是全国少数几个比较有名的以文科见长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哲学学院在全国哲学界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比较少有的学科齐全、学术传统深厚的哲学教学与科研单位之一。其中,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在中国大陆得到同行专家们的首肯与赞誉,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我们这个中国哲学研究群体,是以萧萐父、李德永、唐明邦、陈修斋、杨祖陶、刘纲纪先生等老一辈学者为第一代开创者,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主张德业双修;以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对比为宏观研究构架,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契机与生命力为基本学术出发点,平章儒道墨释,涵化中印西马,认定明清之际为中国学术与文化的近代性的生长点,吸收并扬弃了梁启超、钱穆、侯外庐等人有关明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思想成果,将中国文化“自万历到‘五四’的三百多年的自我更新历史看作是一个同质的近代文化的运动过程”,从而论定,中国文明在世界性的由国别史向世界史迈进的进程中,是少有的几个具有原生、内发现代文化形态的主要文明形态之一。在第一代学人开创的事业基础上,第二代、第三代学人,一方面深化前辈学者的许多固有的学术

问题，另一方面也根据新的学术发展情况，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新出简帛文献中的哲学思想、佛教禅宗哲学研究等领域，做出了新的贡献。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进一步地走向世界，世界也在进一步地走进中国。中西比较哲学也将成为本哲学研究群体新的生长点。

本套丛书，主要展示了近几十年来在珞珈山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第二代、第三代部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中部地区最新进展的大致轮廓。丛书以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为主要内容，其中有少量涉及中西比较哲学与比较宗教学思想。这些内容反映了珞珈中国哲学第一代学人“汗漫通观儒释道，从容涵化印中西”的宏伟学术理想，正在第二代、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活动中慢慢地实现着。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在当前的语境下谈“中国哲学”，可以分成“中国人的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两大类。所谓“中国人的哲学”，即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哲学，而“在中国的哲学”，则是指来自西方、印度等域外而在中国被传播、接受、研究的哲学。“中国人的哲学”当然离不开“在中国的哲学”，但又不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民族的问题，乃至当今世界的问题，依据自己民族的固有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思想资源，提出一整套哲学的解决方案或思想方案。这便是“中国人的哲学”的主要内涵。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珞珈中国哲学，是一条通向未来中国哲学的可能之路。它揭示了这样一种学术理想：居住于珞珈山下的中国哲学研究群体将努力依据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整合其他民族的思想资源，创造出一种“中国人的哲学”。这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学术理想，目前的这套丛书与此目标和理想还相差很远，但可以看作是通向此目标与理想的一级台阶。

是为序。

吴根友

2008年2月4日

目 录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

对一个哲学史方法的思考	2
中国辩证法史研究刍议	12
中国传统哲学史方法发微	21
方以智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	30
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	39
冯友兰与中国哲学史学	52
关于东方文化研究的几个方法学问题	64

儒家伦理与名家辩学

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	76
道德的中庸与伦理的中庸	85
儒家伦理三题	98
儒学的演生、分化、整合与发展	109
惠施公孙龙辩学钩沉	116

宋明哲学片论

张载《正蒙·太和》解读	134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154
张载的本体论与境界论	169
张载哲学中的“体”与“本体”范畴	180
何心隐新论	194

冯友兰与新理学

冯友兰“共相说”钩沉	208
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	225
“新理学方法”简论	241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评析	255
冯友兰的“生活方法新论”	266
冯友兰与文化保守主义	275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	289
哲学理性与宗教关怀	302
冯友兰对新理学的反省和认同	314
走近真实的冯友兰 ——读两组关于冯友兰事迹的文字联想到冯友兰研究	326

日本文化管窥

我所看到的“日本文化”	338
日本比较文化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342
日韩学者对儒家传统的再评价	355
附录 田文军论著要目	360
后记	365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

对一个哲学史方法的思考

今天,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人们所关注的都是方法的更新、内容的更新,并认定后者有待于前者。哲学史领域也不例外。80年代以来,人们不断探讨哲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历史和逻辑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尤为人们所重视。但是,人们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思考,重在其实用价值,对于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科学内容、同其它哲学史方法的关系及其在哲学史方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探讨不多,以至于当现代科学方法不断向哲学史领域渗透的时候,人们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理解尚有歧异。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工作实在是一种连续不断地觉醒”^①。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确有必要对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以使我们对这一方法论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置于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

要了解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方法论原则在哲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应当从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自身谈起。

历史与逻辑统一之所以成为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之一,就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的一个基本原则,它科学地反映了人类认识的客观实际,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从理论上看,这一方法论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决定意识这一认识论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在内容上有一致和相通的地方。正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三者虽是统一的,但作为科学,又各自具有其特殊的内容一样,历史与逻辑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页。

统一的原则也具有自身的科学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基于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上对人类认识活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反映和概括。为了科学地了解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原则的内容,我们不妨作一些历史回顾。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1845年春马克思写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已经确立起实践的概念,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则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极其透彻鲜明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这一新的世界观中无疑包含着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些基本理论原则。但严格说来,这时马、恩还没有明确从理论上论及历史与逻辑统一的问题。历史与逻辑统一作为一个认识论和辩证逻辑的原则,其确立是与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完善自己的经济理论而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曾给予深刻的批判改造,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批判改造以及对其合理成分的吸取。

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力图将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进行研究,并基于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史观的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史观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并且认为“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①。因此黑格尔把揭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被认识了必然性”看作“哲学自身的课题和任务”,而把研究“理念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发展环节之出现在时间中,在变化的形态中,在某些特殊的地域中,在这个或那个民族里,在某些政治环境里,或在由政治环境而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②的发展情况看作哲学史的任务。但是黑格尔认为这样的哲学史并不是一堆知识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3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4页。

聚集,哲学史本身就是科学的。研究哲学史必须将其看作一个有机的演进的全体,“一个理性的联系”。对于这样的哲学史中出现的哲学系统概念,剔除其“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如果掌握了逻辑进程,又可以从这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这样黑格尔就把哲学在理念里发展的阶段与在时间里发展的阶段这样两个相互有别的次序统一起来了,并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①在辩证思维中,黑格尔实际上猜测到了逻辑与现实的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以及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之间有机的联系和统一。黑格尔哲学结束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科学领域中的支配地位,也具体否定了自康德以来把逻辑看作“纯粹的思维形式”的错误观念。但是从整体上看,黑格尔理解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又是一个非科学的原则。因为他把现实的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看作是“绝对精神”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就像恩格斯说的,虽然他的思想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紧紧地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②。历史与逻辑的真实关系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是颠倒的,他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前提下,没有可能推导出科学的结论。但这丝毫也没有妨碍他为人们科学地揭示历史与逻辑的联系准备思想资料和奠定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正是从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观中表述的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出发的。

从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问世,这一过程不仅标志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完成,也是马克思在实际的科学的研究工作中,继续批判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发展自己世界观的过程。特别是在构思《资本论》的理论系统时,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运用已是炉火纯青,使得他能够从理论上论释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论述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4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论述得更加具体。他说：“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又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且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这是经典著作中关于历史和逻辑关系最集中的论述。它不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和逻辑概念，而且论述了两者的辩证联结。

从恩格斯的论述来看，历史应涵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自身发展的历史，一是对于历史地发展的客观事物认识发展的历史。政治经济学是人们对一定社会中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反映，“政治经济学文献发展的历史”，则标志着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关系认识发展的历史，这种认识发展的历史，大体上反映着人类社会经济关系“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这一历史进程。正因为如此，它才可能对批判以往的经济学提供“能遵循的自然线索”。逻辑在恩格斯的论述中主要是指根据对历史的反映而形成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指以抽象和理论的形式反映“历史进程”的“思想进程”。基于这样的规定，恩格斯肯定了历史和逻辑统一：逻辑以历史为根据，逻辑的东西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在逻辑中的再现。历史与逻辑统一并不是机械的，而是本质的统一、具体的矛盾的统一。因为“思想进程”对“历史进程”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但修正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

恩格斯对于历史与逻辑关系的论述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后来他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22页。

《自然辩证法》里对自己的论述作了补充和发挥。他说：“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发展的关系，正像某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个别胚胎中）。”^①这里恩格斯指出了他过去不曾明确论及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又一层含义，即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与具体个人思维中的逻辑进程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具体思维的形式、规律即逻辑思维运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与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上一致。我们无需论及辩证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但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具体思维的逻辑进程即辩证的思维运动，这是一个遵循辩证思维规律的必然过程。因此思维的发展史与人们具体的逻辑思维进程的一致又包含认识史与认识规律一致。这一思想被列宁表述为“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与思维规律相吻合”。列宁的论述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得到了全面明确的表述。我们只有全面地了解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原则，才能与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划清界线，才能在理解这一原则在科学研究中普遍的方法论价值的同时，又认识这一原则对于哲学史研究的特殊指导作用。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对于哲学史研究工作特殊的指导意义是由哲学史研究的特殊对象决定的。哲学是人们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它要揭示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而哲学史则是人们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它要揭示人类哲学认识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因而哲学研究既涉及人们的哲学认识与客观世界发展历史的关系，又要具体涉及人们的理论思维与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识发展史的关系，以及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与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的关系。可以说哲学史是要求揭示人类理论思维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指导哲学史研究，是使哲学史研究科学化，担负起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人类理论思维发展规律的关键所在。

黑格尔曾说“方法就是对于自己内容的内部自己运动的形式的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1页。

识”^①。列宁十分重视黑格尔这一思想。在唯物主义者看来,当人们以对于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认识、反映而形成的理论原则来指导科学的研究时,这些原则也就是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这一原则也是我们从事科学的研究的具体方法,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这一方法具体为历史的方法或逻辑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是从具体历史事实开始,通过对研究对象自然历史进程的考察来展示对象的发展。由通过对研究对象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的考察来展现对象的发展,揭示对象发展的规律性,使历史的方法具有再现研究对象发展历史完整性特点。逻辑的方法是将对象的发展进程在思维中以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无须顺应对象发展的历史线索,可以剔除对象发展中的偶然因素,抓住表现对象本质的部分进行研究,来体现对象的发展,揭示对象发展的一般规律性。作为方法,这两者各有特点,但本质上又是同一的。恩格斯曾说逻辑的研究方式实际上就是历史研究的方式,逻辑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②。由于逻辑的方法可以“摆脱历史的形式和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人们以为理论科学应以逻辑的研究方式为主,历史科学则应以历史的研究方式为主。恩格斯就曾认为,根据 1851 年前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和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情况,当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那么在哲学史研究中应当取哪一种研究方式呢?

哲学史研究中似乎应以历史的方式为主,其实不然。哲学史作为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固然在历史科学的范围内,但它有别于其它历史科学。它不可能仅依靠具体的历史事实来揭示哲学认识的发展规律。它需要根据客观物质世界发展的历史去考察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离不开对哲学系统及哲学概念范畴演变发展的研究,故不可能单纯运用历史的研究方式。哲学史研究中侧重于逻辑的方式也不尽妥当,因为在哲学史研究中虽然可以哲学概念范畴的考察去再现

^① 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3 页。

客观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哲学史毕竟属于历史科学,它应当完整地再现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哲学史研究的这种特殊性要求我们把历史的方式和逻辑的方式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以此为轴心,形成一个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这一系统中的各个具体环节各从一个侧面体现哲学史研究中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换言之,只有坚持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运用哲学史研究中的各种具体方法。这些具体方法有以下内容:

史料的判别。哲学史研究同任何学科一样,“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①。历史上的哲学文献遗漏很多,而且常有伪撰之作,尤其是中国哲学史。我们要分析各种哲学史料的“发展形式”,探讨其间的内在联系,首先需判定文献的真伪。判定文献真伪的方法很多,但升华为理论,唯有使判定的方法贯彻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中国哲学史中,对《周易》的成书年代有断定为春秋时期者,有说为西周初年者,确切年限难有定论。但人们以《周易》中“帝乙归妹”、“丧羊于易”等记述反映了殷周之际的历史事实为据,将《周易》作为代表殷周时期的理论思维发展的史料,则为哲学史工作者所接受。又如《庄子》,有人认为其内篇为庄周作品,有人则以外篇代表庄周本人思想。有学者以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考察《庄子》内外篇概念的使用情况,发现内篇常用一些单一的概念,如道、德、性等,而外篇则出现了道德、性命这类复合概念,并由此断定这种概念的演进历程应当与客观的社会进程一致,内篇早于外篇,可视为反映庄周本人思想的作品,这种断定言之成理,较有说服力。可见在文献问世的确切年限无法考定的时候,判断史料、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

历史的分析。哲学史研究中,对哲学的历史分析是必须的。因为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哲学作为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哲学认识的发生发展,既受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类理论思维能力的制约,也要受客观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制约。研究哲学史必须把具体的哲学理论纳入具体的历史环境,探寻哲学理论赖以生存的历史根据和经济土壤。这就要求我们对某一哲学理论形成的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科学文化进行细密的考察,揭示出哲学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以及哲学与其它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种分析是要通过对具体社会历史的分析,再现“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从而更好地理解“思想进程”的开始。这实际上也是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具体化。

逻辑的分析。哲学史研究,离不开对哲学概念范畴的考察辨析。其目的是要通过辨析把握住反映人类理论思维发展进程的基本概念、范畴演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衡量这种辨析科学与否,就看分析中所展示的哲学思维发展的必然进程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否一致,与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认识的发展史是否一致,是否体现了“思想史与思维规律相吻合”的原则。中国哲学史上,《周易》一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从哲学的角度看,只要透过其占筮迷信的外衣,即可断定其包含丰富的辩证思维萌芽,甚至具有某些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原型。但过去有学者认为,《周易》以阴阳说明矛盾,说明对立面,说明肯定否定,已具备一个完整的辩证法体系。其实《周易》中虽有阴阳观念,但还未明确使用阴阳范畴。这种对《周易》估价偏高的原因就在于对《周易》进行逻辑的分析时,背离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在哲学史研究中,只有在以历史为根据的基础上,对哲学理论、范畴进行逻辑的分析,才能避免拔高古人,将古代哲学现代化,又避免贬抑古人,对丰富的哲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从而通过对不同哲学系统范畴的分析,正确地勾画出人类以范畴为纽结编织成的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网络,揭示出理论思维发展圆圈中的普遍规律性及其特殊的表现形态。

社会属性的判定。历史的东西决定逻辑的东西,逻辑的东西一经形成,又不是消极、被动的,它极大地影响着历史的东西的发展。哲学也是如此。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社会历史的需要,在阶级社会中则是由于阶级的需要。因此,判定一种哲学